



革命救助体系是如何形成的

□ 高中华

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，在革命与灾荒频发的环境中，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救助经验，在继承传统社会救助体系的基础上，建立起全新的革命救助体系。

（一）

20世纪的中国，劳动人民的民生问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救助谁和怎么救助的问题，成为重要的历史课题。革命救助体系之所以产生，既有历史因素，也有现实考量。中国共产党重视社会救助事业，就是因为其直接关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败。

面对频发的战乱与灾荒，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如果不予以重视或重视不够，不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，或制定了措施而不注重落实，那么灾区的广大人民必然陷于饥饿，甚至死亡。只有尽一切努力解决群众的生存问题，尽一切途径帮助群众摆脱困境，才能团结广大群众。

党领导开展的社会救助工作，进一步密切了党同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，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，从而尽可能地广泛动员社会各阶层参加到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之中。特别是推行社会救助事业，减轻群众的负担，改变旧有的劳动关系，不仅提高了劳动者的热情，而且逐渐改变了农村落后的生产关系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。人民群众进而自觉地维护这些长期斗争的成果。党对于破坏法令者，予以裁决，给予斗争，逐步改变了封建的政治关系，进而影响和改变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。实施这些制度的过程，就是改造社会的过程。

为了能够提高人民战胜困难的自觉性，党努力做好动员工作，把人民的义愤正当当地集中于困难的制造者——国民政府及帝国主义在华势力，从而动员全党全民，实现了生存和发展的结合，实现了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的结合，体现出救助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。

（二）

面对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双重历史使

命，党领导的社会救助工作就是“组织起来”。社会救助工作，不仅是生产问题、经济问题，而且是政治问题。在灾荒期间，如同对敌斗争一样，根据地从上到下，不分男女老少，都紧急动员，齐心协力开展救灾工作，从而在广大革命根据地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动员机制。

革命根据地开展的社会救助工作，不仅是具体的工作，更是凝聚革命传统和传播革命文化的有效途径，不但符合物质保障和精神保障相结合的原则，更成为革命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。党实施的一系列救助措施，既发扬了包括团结互助在内的革命精神，又丰富了革命精神的内涵，使革命精神得以付诸实践，并在实践中不断升华。

党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是根据地社会救助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因素。根据地的宣传组织工作形式多样，主要有书写标语、散发传单以及演白话戏、唱革命歌、办革命报刊等。党领导的地方党团组织在广大群众中通过宣传与组织动员，把人民战胜困难的自觉性发动起来，把战胜天灾人祸的组织程度提高起来，从而把各种潜在的力量充分释放出来。

在艰苦的战争年代，在组织社会救助的过程中，在生产救灾、社会优抚、劳动保障的过程中，领导干部发挥了表率作用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与广大群众同甘共苦，参与生产救灾，战胜灾荒，优抚军人群体，保障劳工权益。在接连而至的灾荒面前，党通过组织、思想、政治等多个方面进行普遍深入的动员，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，把救灾与生产等融为一体，把政府力量与社会、人民和军队力量融为一体，把自身解放与阶级解放结合起来，把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起来。

（三）

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社会救助的内容也不断得到充实与完善。但根本的一条是，社会救助事业与阶级社会紧密相连。党出于生存与发展的考量，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救助措施。社会救助事业的内容，不仅包括赈灾、济贫，还包括优抚、保障、福利等多方面的内容；救助群体以弱势群体为主，包括烈属军属、移民、难民等。

为了更有效地落实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各项政策，党实施了一系列救助法令措施，组织了专门机构，负责组织落实工作，充分发挥政府救助的功能，并与民间救助机构相互配合。在实施救助法令及措施的过程中，注意将法令政策的作用发挥到最大程度。

革命根据地注意加强政府救助和群众互助的结合。如抗日战争时期，根据地的劳动

（上接1版）

稳中求进已成共识，信心和决心不断增强，巨大的增长潜力正在转化为增长动力，推动经济砥砺前行。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，我国物质基础雄厚，具有保持稳定增长的巨大潜力和坚实基础。各地区各部门底线思维基本形成，各方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将进一步增强，主动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，努力化解各种问题、矛盾、风险和困难，上下联动确保经济平稳运行。

（二）不利因素

从国际看，国际环境依然错综复杂，外部需求环境依然疲软。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深度调整还未到位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总体特征尚未出现转折性变化，影响经济短期平稳运行的扰动性因素仍未消除。从发达经济体看，美国在今年12月15日再次加息后，明年加息节奏可能加快，无疑会对全球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和我国汇率造成冲击，加大我国资本流出压力。欧洲德国、法国等大选后政治、经济政策面临调整，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会通过贸易、投资、金融等多渠道影响我国经济平稳发展。从新兴经济体看，我国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有所缩小，新兴经济体对我国的替代竞争增强，产业和贸易转移对我国冲击仍将持续。此外，中东地缘政治持续紧张，朝核问题日趋复杂，也将对我国产生一定影响。

从国内看，多重因素交织共振，经济平稳运行受到挑战。在供给方面，制造业在短期内难以重回常态增长轨道。传统落后产能还在市场尚未出清条件下恢复增长的阻力还比较大，短期内新兴产业替代和弥补传统产业带来的增长损失尚需时日。同时，企业将过多的资本资源投向中低端产业，资本、技术、人才积累严重不足，导致我国需要发展的中高端产业上不来，这种局面短期内难以改观。此外，短期内某些新兴产业比如网络商店的较快增长，还以替代传统产业并造成其萎缩为代价。制造业不景气还使得与此相关的生产性服务需求不足。从需求方面看，内需短期内难以明显扩大。一方面，投资内生动力不强，虽然国家投资增长较快，但民间投资一直不能及时跟进，有效投资不足的局面一时难以改观，投资下行压力依然较大。另一方面，受就业冲击、股市低迷等因素影响，居民收入增长放缓，消费信心和预期上放慢，都将制约消费需求增长。在重要市场方面，今年经济增长贡献较大的车市和楼市还存在不确定性。明年小排量汽车税收优惠政策已经调整，房地产市场也将进一步抑制资产价格泡沫，这两大市场均可能会出现稳中收紧趋势。

政策建议

经济下行的压力有周期性、总量性因素，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矛盾，要继续坚持“稳中求进”的工作总基调，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适度扩大总需求，加快新旧动能转换，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。

一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重塑实体经济竞争优势。紧紧抓住处置“僵尸企业”这个牛鼻子，进一步化解传统产业产能过剩。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，通过支持企业市场化、法

互助组织主要有变工队、扎工队等，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形式，包括人工换人工、人工换牛工、牛工换人工、牛工换牛工、集体养牲口等。实行这些方式，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农村面临的人力、畜力、农具缺乏的困难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。这些劳动互助组织的工作并不局限于农村，还扩展到拥军优抗、生产救灾等领域，在帮弱救贫、优待军人及其家属方面，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中，党的制度革新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。党的社会救助对于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。历史经验充分证明，社会愈发展，救助的内涵愈丰富，其社会功能也愈完善。对于革命根据地的情况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·斯诺曾亲眼所见，在革命战争时期，根据地遭受严重的水旱自然灾害，处于国民党政府的重军事包围和层层经济封锁下，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发生“饥馑之患”，而且许多地区在生产上还获得了较好的收成。为此，他指出：“当我想起红军游击队在这区域作战，时进时退，已达五年；想起它的经济始终保持得住；想起苏维埃没有饥荒；想起所有农民都收受并信任苏维埃货币——当我想起这些时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的奇迹！事实上，这不能只靠财政来说明，只有从社会和政治基础上着眼才能理解。”

中华春秋

治化债转股，加大股权融资力度等，把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点。减少审批环节，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，降低企业用能成本，降低物流成本，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。从重要领域、关键环节、突出问题着手，补软短板、硬短板和制度短板。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提高农产品供给质量和水平。

二是保持总量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，促进经济平稳运行。一方面，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。预算安排要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、保障民生兜底的需要。建议对企业采取全面降税措施，在推出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之前，建议适当提高个税起征点，适当扩大政府财政赤字率到适当水平。并通过稳定扩大有效需求，加大政府投资补短板力度，增强民间投资发展信心和意愿。通过稳定传统消费，提升消费热点和亮点，拓展新兴消费，释放消费增长潜力。积极培育出口新增长点和新竞争优势。另一方面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。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，调节好货币闸门。在M2基数已经相当大的情况下，适当控制货币增速，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，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。加快发展民间金融机构，支持开展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试点等。增强汇率弹性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。

三是加强防范风险隐患，推动市场健康稳定发展。进一步强化风险监测和预警，防控债务违约风险，防范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大幅波动，防范资本外流和外资企业撤资风险，防止市场间风险“交叉感染”。对地方政府债务、国有企业债务进行杠杆风险红线管理。综合运用金融、土地、财税、投资、立法等手段，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、适应房地产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，分类调控，因城因地施策，在抑制资产泡沫的同时，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，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。

四是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，实现新旧动力的有效接续。坚持创新驱动发展，对新动能加大扶持力度。新动能既包括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新能源汽车、生物技术、绿色低碳、高端装备与材料、数字经济等支柱产业，也包括培育发展空天海洋、信息网络、生命科学、核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。还要注意在空间上用区域联动理念培育经济增长极和增长带。比如，以我国“两横三纵”空间布局为依托重点打造几个增长极和增长带。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，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。

五是稳定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，加强民生保障。强化社会政策托底作用，着力化解就业结构性矛盾和影响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的不确定因素，筑牢民生底线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做好去产能重点地区、行业的职工转岗安置，抓好高校毕业生、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。深入推进精准扶贫，多元化、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。加大民生补短板力度，强化社会保障，增进民众福祉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）

徐渭：一代奇才的分裂人生

□ 徐问笑

徐渭，字文清，后改字文长，别号青藤老人、山阴布衣等。因民间流传徐文长之轶事趣闻甚广，故几百年下来，世人唯知徐文长，而不知徐渭其谁也。2011年，徐渭的一幅《墨葡萄》拍出了3795万的价格，其后《花卉手卷》更以5328万之天价成交，其他流传于民间的作品，亦多以千万之高价被人拍下收藏。另有一些存世的精品之作，则多为故宫博物院所收藏，堪称价值连城。不过，悲哀的是，虽徐渭一生创造出如此之多的国宝级作品，但他生前却是“笔底明珠无处卖”，其晚景之潦倒、凄凉，简直让后世之人难以想象。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，藏书数千卷被变卖殆尽的他，是在“两间东倒西歪屋，一个南腔北调人”之贫苦境遇中，结束了自己堪称惨痛、分裂的一生，死时身边唯一一狗与之相伴，床上甚至连一铺席子也没有。

庶子出身 屡试不第

徐渭在今日，亦有“中国的梵高”之称，概因二人同为美术界天才，皆是“生前落魄、身后扬名”且兼有“自戕”之经历。不过，梵高虽在绘画艺术上为不可否认的天才，但在其他领域却未曾有任何建树，而徐渭却是集书画家、文学家、戏曲家以及军事家于一体的，且哪一方面单拎出来，都是天才级水平。徐渭出生于正德十六年（1521年），父徐鑑曾任四川夔州府同知，后致仕回绍兴老家，其长子徐淮、次子徐路，皆出于原配童氏。后因继室苗氏不能生育，故纳其婢女为妾，生下徐渭，其时，两嫡兄早已结婚成家。

徐渭百日时，年老的徐鑑去世，徐渭由嫡母苗宜人抚养成人。不同于红楼梦王夫人视庶子贾环为“肉中刺”之态度，无子的苗宜人，对徐渭的教养是极其用心的。其“保爱教训渭，则穷百变，致百物，散数百金，竭终身之心力，累百纸不能尽，渭躬百身莫报也”。

（《嫡母苗宜人墓志铭》）。然也正是苗宜人，在徐渭十岁时，不顾他一再哭求，仍狠心将其生母发卖出去。此人伦悲剧，让小徐渭深切体会到身为庶子之悲哀：在嫡母与两位嫡兄面前，他并无地位可言；于外界，亦为世人所轻视。

徐渭十四岁时，苗宜人去世，他只得依附于长兄徐淮一道生活。但徐淮好炼丹，且不善理财，以致家财散尽。尤让人寒心的是，他对朋友仗义疏财，却可能为幼弟略作打算，以致成人后的徐渭，竟无钱娶妻，只得入赘潘家为婿。要知道，在父权社会中，入赘是一个男人最大的无奈和羞耻，更何况作为读书人的徐渭了。更为可怕的是，徐淮死后，祖产居然被乡里姓毛的无赖霸占，而作为唯一继承人的徐渭（两位嫡兄死时皆无子），却因为其入赘之行为，而被剥夺了继承权。徐渭

内心的悲愤和憋屈自是可想而知，这也是他此后大半生皆汲汲于功名之缘由。对徐渭而言，科举考试无疑是他改变其卑下之地位的唯一出路。

徐渭平生最为自信的，亦是自己的满腹才学。他自幼天资聪颖，六岁读书，“九岁能为举子文，十二三赋雪词，十六岁拟扬雄《解嘲》作《释毁》”（《赠妇翁潘公序》）。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，比之为刘晏、杨修。殊不知，拥有“指掌之间，万言可就”之惊世才华的徐渭，却在科举考试上极其坎坷、失意。自他二十岁时考中秀才后，此后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，连考八次，竟次次名落孙山，以致终身不得志于功名。

既遇恩人 何遭殃及

嘉靖三十八年，“威震东南，权倾一时”的胡宗宪欲聘徐渭为幕府“师爷”，不料落魄如徐渭者，初时竟是抗拒的，他“数赴而数辞，投笔出门”。徐渭为人疏狂，一是不愿受到束缚，二是对胡宗宪依附严嵩一党非常不满。然而，以他之见识，又很清楚胡宗宪所图之大计，亦是关乎沿海万千百姓之安危，此乃大节。何况他“自负才略，好奇计，谈兵多中”，若不能为胡宗宪所用，亦是可惜。因此，他除了替胡宗宪起草疏滕奏章外，在军事、政治和经济事务上亦多有出谋献策，据《明史》记载：“渭知兵，好奇计，宗宪擒徐海、诱王直，皆预其谋。”故后世有人评价，徐渭堪为天下第一师爷。绍兴师爷之所以能在清时盛行三百年，徐渭作为同乡亦起了极大的表率作用。

不过，虽胡宗宪因徐渭之助，得以建大功；然徐渭得胡宗宪之赏识，则更是他一生中的幸事，若非胡宗宪不拘一格用人才，他又何来一展才华与抱负之机会。同时，胡宗宪还是一位慷慨的“老板”，不但让穷“员工”徐渭生平第一次过上“食鱼而居庐”之富裕生活，且在他的张罗和资助下，还娶到年轻貌美的张氏为继室。可以说，胡宗宪不仅是徐渭的伯乐，亦是他的恩主。

因此，当随着严嵩的倒台，胡宗宪因受牵连而遭到革职，且次年被捕入京，不久便冤死于狱中时，对徐渭而言，不啻晴天霹雳。他既恐自己有被牵连之可能，又为自己无力解救胡宗宪而觉得痛苦，忧惧交加之下，以致精神彻底崩溃。陶望龄说他“及宗宪被逮，渭虑祸及，遂发狂，引巨锥刺耳，刺深数寸，流血几殆。又以椎击肾囊碎之，不死。……至是又击杀其后妻，遂坐法系狱中，愤懑欲自决”。

他自戕之程度，简直让人闻之骇然、听之变色。然而不管徐渭妻出于何种理由，终究为律法所不容，因此，虽在诸友人积极营救下，他得以免于死，但也经历了七载被囚生涯。出狱后，徐渭关注国事之心虽依然如故，然而已不再有政治上的抱负，但他教授李成梁

之子李如松兵法，却是无意中又造就了一代名将，可谓功在大明。

徐渭为人狂放不羁，因与好友张元忬性格不合，彼此交恶后半生。但张元忬去世时，徐渭却“白衣往吊，抚棺恸哭，不告名去”（《明史·徐渭传》），足见其乃真性情中人也。临终前，他将张氏父子与嫡母、胡宗宪一起列为平生四大恩人。故张元忬之子认为徐渭与其父“非世俗交耳”。

诗家不幸 艺术幸耶

徐渭在诗文、戏剧、书画等各方面皆成就非凡，故有明一代，虽人才辈出，唯徐渭以其落第文人之身份，与解缙、杨慎被并称“明代三才子”。他是中国“泼墨大写意画派”创始人、“青藤画派”之鼻祖，其画能吸取前人精华而脱胎换骨，不求形似求神韵，山水、人物、花鸟、竹石无所不工，以花卉最为出色，开创了一代画风，对后世画坛（如八大山人、扬州八怪等）影响极大。郑板桥曾亲刻一印“青藤门下走马走”，亦足见对其何等之崇拜。书善行草，写过大量诗文，能操琴，谱音律，爱戏曲，所著《南词叙录》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，另有杂剧《四声猿》《歌代啸》及文集传世。

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年），袁宏道于陶望龄家中作客时，无意中发现了徐渭的诗文，“不觉惊讶”，“叫复读，读复叫”，为其“恣睢谈谐，了无忌憚”的诗风所倾倒。对徐渭之书画、诗文、戏剧作品，他无一不给予极高之评价，说“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，字画之中，宛宛可见”，且认为“文长眼空千古，独立一时”，更称其为“有明一人”。也正是袁宏道之大力宣扬，徐渭才得以声名大震。

其时，从生前寂寞到身后扬名，距离徐渭去世时间仅三年之隔，不得不让人怀疑，这是造化之手对徐渭的又一次刻意捉弄。徐渭此人，正如陶望龄的评价，“古今文人，牢骚困苦，未有若生者也”，其一生是挣扎于两难之中：譬如嫡母苗宜人，对他既有养育之恩，又有逐母之恨，可谓亲情难两全也；譬如张元忬，对他既有救命之恩，又有断交之憾恨，可谓恩义难两全也；譬如胡宗宪，对他既有知遇之恩，但又有附逆之恨（他敬重且视之为知己的姐夫沈炼及其二子，正是惨死于严党之迫害），可谓忠义难两全也；譬如他明明自负于才华，却偏偏失意于科举考试，可谓志向难酬也。再如夫妻之情，尤多波折，四次婚姻，皆是惨淡结局，两次入赘，一次是买卖婚姻，唯最后一次张氏，是正常的婚聘程序所娶，却最终为徐渭所疑杀。足见，他的人生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，可怜一代奇才，面对如此无常之命运，最终亦难避免人格分裂之结局了。

人物志

中，他叹息说：“假令万一除刑部囚籍，复为士列，亦不堪当世用矣。”（《新唐书·柳宗元传》）可见在唐代，不少被贬官到远方的官吏是戴罪之身，属于“刑部囚籍”。譬如柳宗元、刘禹锡等人，在元和元年的一封信书里更是被列入“纵逢恩赦，不在量移之限”，归来可谓遥途万里，令人绝望。而在此等情况下，能够保持精神旷达，且能造福一方，实是难能可贵。

史海拾零

唐代贬官制度

□ 徐 佳

《唐会要》记载了唐代贬官制度，“京职之不称者，乃左为外任；大邑之负累者，乃降为小邑；近官之不能者，乃迁为远官”。唐代京官，常被贬到外地，如玄宗时，张九龄为相，获罪后被贬任荆州长史，从一品大员直降为六品小官，可谓“断崖式降级”。张九龄南下途中，写诗自励“江南有丹橘，经冬犹绿林。岂伊地气暖，自有岁寒心”。

宪宗时，柳宗元自礼部员外郎贬为邵州刺史，赴任途中，再贬为永州司马，到任之后，北望思乡，写下“海畔尖山似剑铓，秋来处处割愁肠。若为化得身千亿，散上峰头望故乡”之句。但他惊诧于“永州之野产异蛇”，感叹“赋敛之毒，有甚于是蛇者乎”，虽身处险境，仍不忘民生多艰，不改其志士本色。在写给京师故人的信